

語言書寫與文化普遍性
——柄谷行人與德希達的語言論爭與民族問題

黃雅嫻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摘要

在這篇研究中，筆者將通過兩個進路來分析圍繞著「文化普遍性」這個概念而來的幾個問題，主要是語言的形成以及帝國主義：一是從語言的內部元素以及結構進行討論；另一條進路則是討論語言與民族認同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這些問題乃起於柄谷行人與德希達兩位思想家，圍繞著語言學家索緒爾的理論而來的論爭。柄谷認為，索緒爾的語言學乃是為了考察倚賴語言而存在的人類學條件，但民族語言的形成其實是政治經濟等外部力量操弄下的結果，要研究索緒爾的語言學就不能忽視這些外部力量匯聚而來的事件與索緒爾的關係。因此，對柄谷來說，對索緒爾語言學的研究除了結構主義者所看重的語言形式與結構之外，還在於當時與帝國主義崛起的關係。換言之，他反對德希達對索緒爾的分析方式。

另一方面，德希達通過解構的方法對索緒爾語言學進行分

投稿日期：2020.07.26；接受刊登日期：2020.12.28

《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第 12 期 (2021)：001—040

《現象學與人文科學》第 12 期

析，這意味著德希達的分析集中在文本內部的構成元素與結構的關係，而不是文本外部與諸種力量之間的關係。在德希達的研究中，索緒爾的理論不僅是語音中心主義，還是邏各斯中心主義，這兩者同樣都與西方的形上學傳統有關。

總之，環繞著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而來的論爭，涉及了語言學理論本身、形上學、民族認同以及文化殖民主義。

關鍵詞：語言與書寫、民族主義、文化普遍性、德希達、柄谷行人

語言書寫與文化普遍性 ——柄谷行人與德希達的語言論爭與民族問題

一、前言

青年時期歷經安保鬥爭（1960-1970）的左翼評論家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 1941-），自就讀於東京大學經濟學部時期，便投入全學連，對抗美帝運動。自此，以關係連動變化觀點思考國家、社會以及經濟等三方結構，就成了柄谷一生的志業。儘管1974年以《夏目漱石論》獲獎，其後也有為數可觀的文學評論，但其評論觀點仍不脫上述結構。四年之後，柄谷出版了《馬克思主義其可能性的中心》，便更確定了其思想路線。七零年代後期，訪問耶魯大學之時，與保羅·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相交，受其理論影響，並在一定程度上熟悉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所從事的解構思想，這也是為何我們總能在其著作中屢屢讀到其對既存現象進行思維的形式性的建構之後，又以獨特的方式進行拆解的原因。

儘管德希達自己曾說，解構（Déconstruction）並非方法論，沒有固定的操作步驟可依循，解構乃是通過閱讀，在文本的內部尋求裂縫，打開那看似封閉的邊界，從而使得文本內部出現多重

思想。¹ 而無論是對於裂縫的掌握或者文本的邊緣，對德希達而言，可能是文本中的某個概念的疏理，也可能是通過對於多種文字之間的轉換而來，這也是為什麼德希達以為「文本之外，一無所有」。² 另一方面，柄谷自承閱讀過德希達作品，熟悉解構思想，但他的解構方法卻又全然不同於德希達。柄谷於《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³ 一書的後記曾言：

他（保羅·德·曼）的批評非常形式化，幾乎到了禁慾式的程度。用一句話來概括他一貫的思想，那就是語言背叛書寫者的意圖，完全表達了別的東西。…語言表示意義，書寫者無法操縱也無法預測語言。對德·曼來說，這意味著語言（文本）並沒有成為可以解放，或作為快樂（羅蘭·巴特）來體驗的東西。他是把語言作為『人存在的條件』來探索的。…我所關心的…在於探索通過語言而存在著的人的條件（能力）。⁴

¹ 詳見 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Minuit, 1967), p. 33, 39; *Positions* (Paris: Minuit, 1972), p. 35, 58.

²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 227.

³ 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起源》，趙京華譯（北京：北京三聯書店，2003）。儘管 2017 年參田出版社有了吳佩珍老師的繁體版翻譯，然而以本文最重要的〈書寫語言與民族主義〉一文，卻沒有收錄。因此，我們將以簡體版翻譯作為我們引用的文本。由於筆者不諳日文，因此若有引文將簡繁對照，遇有疑義之處，則以加注方式說明。至於版本問題，若無說明則以簡版為主，以下不再贅述。

⁴ 柄谷行人：〈文庫版後記〉，收入《日本現代文學起源》，趙京華譯（北京：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 214-216。

儘管柄谷沒有直言他所直接繼承德·曼的方法，但從柄谷對於文本概念的形式討論來看，無疑地他更接近德·曼，而不是德希達。正因如此，我們能在柄谷的行文中，看到他反覆地討論文本概念的形式性問題，亦即他並非尋找隱藏在文本深處或者背後的意義問題，而是討論文本表層形式出現的原因與條件。這樣的方法，使得他特別留意外部因素的力量介入，而不是文本本身的裂縫，這也是他與德希達最大的差別。

柄谷曾以政治與民族的觀點分析索緒爾在語言學上的努力，並認為雖然索緒爾主張語言學要研究的範圍在於一個社會處於共同體中的結構，因而屬於靜態的共時性，即語言結構並不因單個言說個體發自偶然性而改變。但柄谷以為，這僅是其學說的表面，若僅是停留在這種表面，就會把索緒爾歸類到結構主義的行列。在柄谷看來，剛好相反的是，索緒爾正是想從語言學內部考察因為語言而存在的人類學條件，而在這之外，都是徹頭徹尾的外在力量（諸如政治與經濟的力量）起的支配作用。既然民族語言受的是外在力量的支配，那麼需要分析的不該只是語言內部與形上學之間的關係，而應放在距離當代比較近的事件。⁵ 對此，柄谷承認德希達的《論文字學》（*De la grammatologie*, 1967）對文字、書寫語言問題的洞察所得出的歐洲語音中心主

⁵ 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起源》，頁 195。

義，給予他很大的啟發，但柄谷以為單單只是分析語言內部，並溯及柏拉圖（Plato），不過是一種顛倒的欺瞞。柄谷的論點最早發表於 1991 年東京世界比較文學會議上的演講，以〈書寫語言與民族主義〉為題，收錄於再版後的《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爾後又經改寫，以〈民族——國家與語言學〉為題收錄於《定本柄谷行人集》（2004）。⁶ 對於柄谷的論點，德希達也在 1995 年於蒙特婁大學舉辦的「柄谷行人研討會」上發表〈對柄谷行人書寫語言與民族主義的回應〉簡單澄清柄谷的誤解。⁷

另一方面，索緒爾的語言學之所以是劃時代性的，就在於他劃定了語言學研究的邊界，亦即區分語言學的内部與外部，並且規定了内部系統與規則之間的從屬關係。概略說來，索緒爾將語言現象區分為「言語行為」（langage）、言語（parole）以及語言（langue）三個部分。⁸ 對索緒爾來說，言語行為的含攝的範圍廣大，橫跨多項領域，屬於社會也屬於個人領域。言語行為的社會領域，對象乃是語言，脫離個人而獨立，因而這種研究純粹是心理的；而個人領域的對象就是言語，既有物理層次（像是發

⁶ 柄谷行人，《民族與美學》，薛羽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6）。相關資訊參見維基百科「柄谷行人」詞條，英文、日文版以及柄谷行人專頁：<http://www.kojinkaratani.com/en/>。

⁷ Jacques Derrida, "Introduction to Kojin Karatani's "Nationalism and Ecriture" A Discussion Summary by Megan Becker-Leckrone," *Surface*, vol. 5 (1995).

⁸ 於此採高名凱的譯法。參閱：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台北：弘文館出版，1985），頁 12-13。

音)，也有心理層次。對索緒爾來說，他關注的乃是語言研究，因而就落在社會的領域。⁹換言之，對他來說，個人的領域附屬於社會領域，有更多的偶然現象，並且屬於次要研究了。也正因為他關心的語言對象是社會的領域，要使同一空間的集體意識都能感覺到，靠的是聯繫起各個同時存在並且構成系統要素間，邏輯的與心理的關係，對於同時存在的語言對象研究，其特點為靜態的，索緒爾稱之為「共時語言學」。¹⁰相對來說，那些不為集體意識所感覺到的相連續的要素間的關係，一個代替另一個，互相之間不構成系統，其特點是演化的，索緒爾稱之為「歷時語言學」。¹¹至於語言學的內部與外部區分，簡而言之，涉及系統與規則的一切屬於語言學內部研究，而語言的分佈與傳播則屬於外部事實，就涉及政治史研究等相關學科。

由以上對索緒爾語言學的簡述看來，柄谷以為索緒爾對內部語言學的執著並非如結構主義者無視於外在的東西，相反地，他是要以此揭示外在東西的外部性。也就是說，柄谷以為，被索緒爾歸到語言學內部的範圍，事實上是受到外部因素影響而導致內部的系統與規則發生變化，柄谷稱之為內面化。另一方面，德希

⁹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s. C. Bally and A. Sechehaye (Paris: Payot & Rivages, 1995), p. 30, 185.

¹⁰ *Ibid.*, p. 141-143.

¹¹ *Ibid.*

達則通過分析索緒爾的語言學內部，上溯至柏拉圖對文字的貶低，來證明西方語言中對於語音的優先乃是因為與形上學結合使然，而不是出自歷史的偶然。對此，柄谷以為德希達的作法同樣忽略了外部力量因素內面化的問題。¹²

儘管柄谷對德希達有若干誤讀，但我們以為柄谷提出的問題卻非假問題，而是一個在地文化與全球化／帝國主義化相遇的深邃提問。德希達也特別指出，語音中心主義與邏各斯中心主義之間有複雜的關係，並非簡單的等同關係。是以，此篇論文我將通過一來一往的方式，討論以下問題：首先，以語言的內部與外部影響因素，討論語言發展問題。這一問題我將以柄谷與德希達共同關注的索緒爾作為討論焦點。也就是說，我想先討論德希達如何拆解索緒爾的靜態語言，但限於柄谷的提問更注重外在力量影響，因此對於德希達豐富且複雜的拆解手法，我只能將問題焦點放在德希達對索緒爾的語言學內外之別上，亦即語言與文字之別、以及隨之而來的表音文字以及表意文字，釐清這問題將有助於我們討論民族主義、帝國主義以及文化普遍性的問題。¹³

¹² 柄谷行人，《民族與美學》，頁 144。

¹³ 事實上，柄谷還討論了世界語的問題，這部份涉及理性的形式主義問題。笛卡兒本人便駁斥了這樣的構想，而萊布尼茲則在他的《單子論》中重拾這個看法，認為漢字的表意系統可以取代拉丁字母的表音系統，有助於建立起世界語。世界語與文化、帝國主義與政治主權等相關問題，涉及篇幅過大，無法在此討論，只能以待來日了。

二、語言的外與內

索緒爾的語言學是否立基於因為語言而存在的人類學條件呢？就此，柄谷以為索緒爾對語言學的內涵的重新劃分，乃是劃時代的。柄谷以為，索緒爾研究的是「連邊界也不確定可以作為習語 (idiome) 的多數語言，但又不是可以通過所謂的方言調查確定下來的東西。…『langue』既不是書寫之物，又不是言說之物，更不是國語。」¹⁴ 由這段話中，引出兩個問題，首先是柄谷認為，索緒爾研究的語言對象不是政治意義上的國語，如法語、德語這種具有國家主權地位被認可的語言。如果柄谷認為索緒爾要研究的對象不是國語，那麼這劃分這邊界的就不是現有國家的主權，因此無論是通過國家主權而獲得地位的國語，或者連帶依靠國語而被承認的方言也都不在此範圍。再者，由前略述索緒爾對語言的重新分類得知，他不認為語言學的研究範圍是言說主體的話語。如果柄谷認為索緒爾的語言不是通過記載、可以復現的文字集合體，更非只有言說而無文字的語音物質，換言之，無論是書寫還是言說都不是決定語言內外的劃分因素。那麼我們有必要先釐清索緒爾的語言學研究內部，才能進一步理解柄谷的主張。

¹⁴ 柄谷行人：〈民族—國家和語言學〉，收入《民族與美學》，薛羽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6），頁 145。

由前言所述，可以得知索緒爾對語言學的研究範圍落在語言內部的規則與系統，與外在的政治地理劃分無關。即使如此，他仍認為傳統語法「缺乏整體觀念」，因而有必要疏理此內部規則與系統的組成。他先將語言學歷史區分為三個階段：「諸階段首先是語法 (grammaire)，此由希臘人首創，法國人一成不變地繼承。它從未以哲學觀點審視整體語言本身。確切地說，它與邏輯有重要關係。一切傳統語法皆為合乎規範的語法，也就是說，皆受擬定好規則的成見支配。」¹⁵ 顯然，索緒爾雖然不贊成語法就是語言學的全部，但仍將語法歸入了邏輯學，而前提則是也要對語法學的內部規則先做檢視與清理。有關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自希臘起，哲學中的範疇以及對存有的思考，就建立在對語法的思考上。對索緒爾來說，語法意味著一種同時存在的各種單位的系統，亦即「每種結構、每種系統都意味著彼此同時的要素」。¹⁶ 正因為語法受限於同時性因素，因而也就如傅柯所言，

¹⁵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remier et troisième cours d'après les notes de Riedlinger et Constantin*, ed. Eisuke Komatsu (Tokyo: Université Gakushuin, 1993), p. 181. 轉引自屠友祥：《索緒爾手稿初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 120。根據屠友祥的考據，現在通行的《普通語言學教程》是巴利與薛施藹兩人重新整理索緒爾的課堂講稿，與索緒爾思想略有出入。而文中所引，則採孔斯丹唐 (Emile Constantin) 筆記，由日人小松英輔編輯，日本學習院大學於 1993 年出版，一般稱為《索緒爾第一次和第三次普通語言學教程》(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remier et troisième cours d'après les notes de Riedlinger et Constantin*)，參閱：屠友祥：《索緒爾手稿初檢》，頁 116-117。

¹⁶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remier et troisième cours d'après les notes de Riedlinger et Constantin*, p. 105. 轉引自屠友祥：《索緒爾手稿初檢》，頁 121。

由語法學建立起來的思想分析是一種空間上的認識論，語言與思想以及符號的關係一如代數與幾何學。¹⁷ 語言學的第二階段則是語文學，亦即涉及一定歷史條件下的語言的運用，其「在研究古代文獻時，把與語言功能以及說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生活有關的一切問題也包含在內。」¹⁸ 索緒爾以為，「一切與語言的組織、規則和系統無關的東西，…屬於外部語言學，雖然重要，卻應從語言研究中排除出去。」¹⁹ 第三階段則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產生和發展。這是運用比較的方法，以一種語言闡明另一種語言。換言之，對索緒爾來說，建立起語言之間的親緣關係，藉以重建歷史，才是一切價值之所在，是以即使溯及了初始型態的古語如梵語，或者在時間上的古遠，都沒有了解比較語法的真正意義。這也是何以「他理解的古老，純粹是從狀態和價值的角度去認識，如果一個語言並不是從另一種語言發展而來，那麼時間上的古老就並不重要。」²⁰

由以上的三個階段說明來看，可以確定的是索緒爾認為他的研究工作乃是語言的內部系統與規則對語言之間的親緣關係的影響，至於外部的文獻學或者語文學，甚至於語言的發生早晚則都

¹⁷ Michel Foucault, *Les mot et l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1966), pp. 95-107.

¹⁸ 屠友祥：《索緒爾手稿初檢》，頁 124。

¹⁹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 44.

²⁰ 屠友祥：《索緒爾手稿初檢》，頁 125。

不在他考慮之列。就此，正因為要緊的是語言內部的系統與規則，因而索緒爾的語言學研究對象就不是歷時性的語言發展變化，而是一個社群內部的無意識的、靜態的共時性。²¹ 所謂無意識並不是說言說主體無法意識到自己所說的內容，剛好相反的是言說主體雖意識到自己所說的話語，但並不能隨意變更代表事物的名稱，因為這些名稱乃是約定俗成的，另一方面，話語本身的語法結構也不能任意更動，意即除了少數例外，所有涉及社群內部的思維與命名均不受個人意識所左右。換言之，索緒爾的語言學與同一時間的社會內部密切相關。其次，語言學之所以是社會性的，其條件就在於「被稱為概念的意識事實是跟用來表達它們的語言符號的表象或音響形象連結在一起的」。²² 就此，我們可以知道，語言乃是由一社群共同的音響形象（l'image acoustique）來表現心中的概念，索緒爾接著說「這音響形象完全是一個心理現象」，緊接著才是生理過程，亦即把此一音響形象傳遞給發音器官。索緒爾接著提到語言學的範圍不限於口說內容，而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la langue est un système de

²¹ 有關共時性與歷時性語言學，索緒爾以為：「共時語言學（linguistique synchronique）研究的是聯繫各同時存在並構成系統的要素間的邏輯上的、心理上的關係，這些關係是同一集體意識所感覺到的。相反地，歷時語言學（linguistique diachronique）研究聯繫各個不為集體意識所感覺到的相連續的要素間的關係，它們一個代替一個，互相間不構成系統。」（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 140. 參酌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頁 108-135。）

²²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 32.

signes exprimant des idées)，因此，可以比之於文字（l'écriture）、聾啞人的字母、象徵儀式、禮節形式、軍用信號等等」。²³ 是以語言雖然來自社會大眾的約定俗成，但命名與對象之間的紐帶關係乃是心理學家的任務，而不是語言學家關切的要點。索緒爾發現，正因為事物的概念並不直接顯示出來，而是通過語言來顯示其概念，顯示其意義，因而對語言學家來說，其任務是「確定究竟是什麼使得語言在全部符號事實中成為一個特殊的系統。…語言的問題主要是符號學的問題，我們全部的論證都從這一重要的事實獲得意義。」²⁴ 既然語言符號連結的不是事物和名稱，而是概念與音響形象，那麼為了不讓我們平日對事物的稱呼，這個感覺部分的觀念涵蓋了觀念整體，索緒爾轉而以「所指」（le signifié）來指稱「概念」以及「能指」（le signifiant）來指稱「音響形象」，索緒爾以為這樣的好處在於「既能表示它們彼此之間的對立，又能表明它們和它們所從屬的整體間的對立。」²⁵ 亦即所指與能指同屬於一個整體，又因為彼此對立的關係，在表述上不致於混淆在一起。

為了更確切地說明語言符號的社會性與整體性，索緒爾以為，語言符號有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在於符號的任意性（l'arbitraire du signe），意即能指與所指的聯繫是任意的。儘管如

²³ Ibid., p. 33.

²⁴ Ibid.

²⁵ Ibid., pp. 97-100.

此，任意性的原則，絕不取決於個別言說主體的選擇，因為符號確立的首要原則就是集體性。此外，記號（le symbole）也不在此列，因為「它不是任意的，它不是空洞的；它在能指與所指之間有一種自然聯繫的根基。如，象徵法律的天平就不能隨使用什麼東西，例如一輛車來代替。」²⁶ 即所謂記號乃以對象物的形似而得。如此看來，索緒爾的符號之所以是社會性的，還在於能指與所指之間沒有自然聯繫、不帶意義的零度符號。當然這一點便遭到德希達的批評，我們也將在後續的篇幅中說明。第二個原則則是能指的線條特徵（caractère linéaire du signifiant），索緒爾認為，「能指屬於聽覺性質（nature auditive），只在時間中展開，而且具有借自時間的特徵（a）它體現一個長度，（b）這長度只能在一個向度上測定：它是一條線。」²⁷ 索緒爾隨後便說明能指的要素乃是相繼出現，構成一個鏈條，只要用文字表現出來，以書寫符號的空間線條代替時間上的前後相繼，這個特徵立刻顯現。很明顯地，索緒爾對於語音的優先性遠遠超過文字，這一點不僅引起德希達對於語音與文字之間關係的興趣，也讓柄谷注意到了文字所起的規範性作用。

由上述索緒爾一再強調語言符號的社會性來看，可以看出來就他而言，語言的內與外的劃分原則為：切斷自然聯繫的社會

²⁶ Ibid., p. 101.

²⁷ Ibid., p. 103.

性。進一步說，雖然語言符號關注的是內部的規則與系統，但此內部仍有從屬之別，即文字需得從屬於語言。他甚至直言，「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用來表現語言（l'unique raison d'être de l'écriture est de représenter la langue）」，²⁸ 「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後者單獨構成的。但是書寫的詞常跟它所表現的口說的詞緊密地混在一起，結果篡奪了主要的作用；人們終於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這符號本身一樣重要或比它更重要。」²⁹ 索緒爾對於口說的詞的強調、嚴詞斥責書寫對語言的僭越（l'usurpation），認為這就跟「人們覺得要認識一個人，與其見到本人，不如看照片」一樣荒謬。如果說，語言反映了心境，而文字作為語言的傳遞工具，這也是為什麼文字被索緒爾看做符號的符號，能指的能指了。

在我們的問題框架底下，可以簡單地將索緒爾的語言學研究分成兩點討論：首先是其認為符號作為人工、社會的產物，必須與自然的聯繫完全切割開來。儘管索緒爾已經將命名的心理紐帶關係讓渡給心理學家，轉而建構語言符號在語言學範圍內的合法與合理性，但在德希達看來，卻造成語音與文字的平行關係。進一步說，德希達認為問題不在於語音文字還是表意文字優先的問題，而在於索緒爾錯把語音與文字想成兩套完全不相涉、毫無污

²⁸ Ibid., p. 45.

²⁹ Ibid.

染的系統，並把真理的特權許給了語音，而指責文字只是能指的能指。為此，德希達以為有必要追索至元文字（*archi-écriture*），他稱之為蹤跡（*trace*）來說明在現有的語音與文字符號系統之前，人們如何表意。³⁰ 事實上，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並非為了讓現有的文字記載得到記憶真確的合法性，而是為了擴大索緒爾早先訂下的文字意義的範圍，一旦文字不再侷限於語音的符號，那麼民族與語言合一的認同基礎將受到動搖。第二點，順著前面的問題而來的，則是對於歷史、自然以及文字記載作為一總體事件的追問。亦即，任何想要為自己的民族找尋到一自然的起源，勢必都要面臨到如今的民族總摻雜了不純、遭到污染的處境，尤其是強勢民族與文化的影響下，弱勢民族或者想要建構起民族主義者，無不訴諸回溯歷史起源之路，於是語言、民族認同與歷史便因此互相交織為一難以辨認又強行追認的事件。基於這兩個問題，我們也將逐一展開德希達對索緒爾分析的討論。

三、能指與真理

如前所述，德希達質疑索緒爾對於語音優先的特權地位。他以為如果我們把文字定義為僅是對語言的紀錄，能指的能指，那

³⁰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 23, 68; Jacques Derrida,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Paris: Seuil, 1967), p. 411.

麼對文字的討論不過就是一種服務於語言的技術討論而已。而對於這種技術的討論，不僅無法討論起源問題，也涵蓋不了特定的文字意義問題。如果文字只是語音的派生，那麼記載下來的現成文字就是人類文明的全部，再無其他意義可言。另一方面，若文字只是派生，服務於語音，那麼將索緒爾奉為結構主義的先驅、並認為他的語言符號學帶來人文學科革命的後繼者們，也無法解讀無文字民族的工藝、舞蹈或者石刻上的銘文等。對此，德希達以為，所謂文字指的是這些東西：

它不僅表示書面銘文、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的物質型態，而且表示使它成為可能的東西的總體；而且，它超越了能指方面而表示所指方面本身。因此，我們用「文字」來表示所有產生一般銘文（une inscription en général）的東西、不管它是否是書面的東西，即使它在空間上的分佈外在於言語順序，也是如此；它不僅包含電影、舞蹈，而且包含繪畫、音樂、雕塑等等「文字」。它也可以指競技文字，假如考慮到那些管理軍事和政治領域的技巧的話，它肯定還可以指軍事和政治文字。所有這些不僅旨在描述與這些活動發生次要聯繫的符號系統，而且旨在描述這些活動本身的本質與內容。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生物學家們今天將生命細胞中最基本的信息過程與文字和程序相聯

繫起來。最後，不管控制程序是否有根本界限，它所涵蓋的整個領域也是文字領域。³¹

德希達擴大了文字的範圍，文字不再只是受所指限制而記下的派生，它甚至就是所指。如果文字僅止於索緒爾的規定，那麼這些人為的信碼、訊息以及程序，不僅無法得到解讀，同樣也無法獲得其本有的意義；而對於人類活動之外，對世界其他生物的活動也同樣無法進一步地探索與研究。³² 倘若我們想否認文字或者想刪除文字在文明活動中的功能，那麼更嚴重的後果還在於我們整個世界以及所繫的文明將會完全崩解，因為這世界的構成乃是由文字本身的明晰性與穩定性保證了派生關係之間的可靠性。³³ 既然文字的範圍不僅止於作為語言的派生，而甚至就是所指，那麼也就有必要越過此一規定，而回到更早先形成此一二元結構的表層分類之前，也是為什麼德希達要討論元文字的原因。

跟文字相比，聲音在西方哲學的傳統中更受到重視，無疑與

³¹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 19. 中譯本：德希達：《論文字學》，汪堂家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以下本書之引文皆參酌此中譯本，不再贅述。文字底線為作者所強調。

³² 對於文字，索緒爾甚至恐懼其將取得主導地位，他曾在手稿上寫下：「…文字叫我震驚，毛骨悚然，這件工作讓我覺得純粹是種痛苦的體驗，與其相對來說不重要的地位極不相稱。倘若我不被迫承認這點，則絕對是不可理喻的。」（轉引自屠友祥：《索緒爾手稿初檢》，頁 134。）

³³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 26.

logos 傳統有關：在場、顯現反映在對聲音的重視更甚於文字的事後追認功能。³⁴ 在場哲學的形成，與語意的透明要求有關，因為儘管話語（parole）不是意義的生產者，卻無疑是心靈（l'âme）的第一傳遞者、第一符號的生產者，其作用在心靈與存有者、情感（les affections）與事物之間扮演了符號的聯繫功能，「最初的約定與自然的普遍的指稱秩序直接相關，這種約定成了言語（langage parlé）。」³⁵ 德希達引用了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話來說明索緒爾的想法是其來有自：「言語是心境的符號，文字則是言語的符號。」³⁶ 另一方面，為了不使初始、理想的意義受到污染，黑格爾（G. W. F. Hegel）在主體的自我顯現以及概念的形過程，賦予了聲音特權。³⁷ 把聲音與真理、存有以及言語（voix）四者加以絕對地貼近起來，這也是德希達為什麼說邏各斯中心主義不過是一種言語中心主義（phonocentrisme）的原因，而索緒爾對於語音符號的重視，無疑地來自這個傳統。

其次，對於寫下的符號系統，大體上有兩種表現方式，一為

³⁴ 限於篇幅與討論目的，我們無法在此複述德希達廣博而精采的論證，僅僅能擷取某些論點加以討論。詳細論證過程可參閱：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p. 15-142.

³⁵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22.

³⁶ Aristote, *Catégories De l'interprétation Organon I et II*, trans. J. Tricot (Paris : Vrin, 2004), I, 16a3, p. 89.

³⁷ 黑格爾在《美學》vol. III, I 中表示：「單純的主體性、物體的靈魂似乎是通過它的共鳴而在這種理想的運動中表現出來，耳朵以理論的方式領會這種運動，就像眼睛以理論的方式領會形狀和顏色，並由此把對象的內在性變成內在性本身。…相反，耳朵感知物體的內在震動的結果，而不置身於與對象的實際關係中。通過這種震動而顯示出來的，不再是靜止的物質型態而是靈魂的最初理想性。」（轉引自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 23.）

表音文字 (écriture phonétique)，另一種則為表意文字 (écriture idéographique)。於此，衍生了兩個問題，首先乃是表音文字在價值上是否高過表意文字，如象形文字。其次，是否有不帶表意的符號？

對於第一個問題，正因為索緒爾不假思索地繼承了西方形上學思維，才會在表音與表意文字系統中，僅僅把文字系統看做只是一套再現外殼。而無論是表音還是表意，對索緒爾來說都屬於口語的再現系統，於是對於他力求「不失真」的、直接的傳播方式才是最為精確的原則，也就不令人意外了。他以為：

只有兩種文字的體系，(1) 表意體系。一個詞 (mot) 只用一個符號表示，而這個符號卻與詞類賴以構成的聲音 (son) 無關。這個符號和整個詞發生關係，因此也就間接地和它所表達的觀念發生關係，這種體系的古典例子就是漢字。(2) 表音體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詞中一連串的聲音模寫出來。表音文字有時是音節的，有時是字母的，及以言語 (parole) 中不能再縮減的要素為基礎。

38

³⁸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 47.

無論是訴諸於內在綜合的表意文字，還是因自然聯繫之故而遭到剔除的「記號」(symbole)，索緒爾容或力圖擺脫心理學的支配而擇定與內心意識、發音器官直接連結的表音文字作為再現的優先順序。但在德希達看來，索緒爾的原則超越了「自然／文化」之間的對立，實則涉及了自然 (physis) 與秩序法則 (nomos) 之間、自然 (physis) 與技藝 (technè) 之間的偶然對立，他並尖銳地指出「矛盾的是，它 (索緒爾的符號系統) 只有以任意的形式並且在自然主義的基礎上，才會承認歷史、生產、制度等等的權利。」³⁹ 對於自然的保護，防止它受到文字的汙染，可說是索緒爾對於語言學的內部與外部設下的防線，因而才極力譴責文字的僭越。

但是表音體系是否真的能夠防止文字的僭越、汙染呢？這個問題就將我們帶到了第二個提問，即是否真的有符號不帶表意？索緒爾將表音文字的科學性設定在對於音位學 (la phonologie) 的差異原則上，就是為了防止語音在歷史中發生變化，因此涉及歷史科學、分析事件與變化，稱之為「語音學」(la phonétique)，語音學則與時間無關，因為發音的機構總是一樣。⁴⁰ 但另一方面，索緒爾又希望我們不要無視於文字的欺瞞：「文

³⁹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p. 49-50.

⁴⁰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 56.

字遮掩住了語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種假裝 (travestissement)。」⁴¹ 文字的假扮來自於它自身的性質：

(1) 首先，字詞的書寫形象使人感到它是永恆與穩固，比語音更適合於經久地構成語言的統一性。書寫的紐帶儘管是表面的，而且造成了一種完全虛假的統一性，但比起自然的唯一真正紐帶，即聲音的紐帶來，更易於為人所掌握。(2) 在大多數人的腦子裡，視覺印象比音響印象更為明確和持久，因此他們更重視前者。結果，書寫形象就專橫起來，貶低了語音的價值。⁴²

這使得語言科學負有一項任務，即必須恢復起言語與文字之間的自然的關係。另一方面，對於符號的任意性，德希達以為所謂的「約定俗成」(institution) 並沒有那麼簡單，因為無論是言語與文字的對立，還是能指與所指的對立，「都必須在蹤跡的可能性之後才有意義」⁴³；因為這種無目的性需要一種綜合，「通過這種綜合，完全不同的東西顯現在它的異在中 (dans ce qui n'est pas lui) ——沒有任何單純性、同一性、相似性或連續

⁴¹ Ibid., pp. 51-52.

⁴² Ibid., pp. 46-47.

⁴³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 68.

性。」⁴⁴

我們可以注意到德希達無論談到表意文字或者符號任意性的可能條件，綜合作用一直是個關鍵。從他翻譯胡塞爾的《幾何學的起源》(*Origin of Geometry*)並寫下了比原文還要長上六倍的導論中，可以發現他並不如胡塞爾樂觀，後者始終信心滿滿地認為按照幾何學的理想本性，其本源活動能夠一再被激活，從而拯救歐洲的危機。對此，德希達始終不認為幾何學的理想性能突破語言本身的不透明性，以及層層的歷史沈積(sédiment)，順利地回溯至活生生的本源中。在對索緒爾的研究中，德希達發現除了需要在其理論的重重理想對立又統合的架構中，需得先有元文字以作為可能性的條件之外，同樣地對符號的任意性／無目的性的統合感到懷疑。這樣的懷疑，並不出自外來的暴力介入，一如柄谷的假設，而是來自索緒爾符號學自身內部的推論。對此，德希達對於心象問題做了疏理，但限於篇幅，我們無法在此展開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論討論。只能說，對於語言與民族國家問題，德希達進行的方式採取的是殖民地法規、記憶等外部討論，尚無如柄谷的內面化分析。⁴⁵

⁴⁴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p. 68-69.

⁴⁵ 類似問題，詳見德希達著作《他者的單與主義—或起源的異肢》。(Jacques Derrida, *Le monolingisme de l'autre ou la prothèse d'origine* (Paris: Galilée, 1996).)

四、從普遍原則到具體例證的批判

對於索緒爾語言學的內部分類，如前所述，柄谷坦承德希達對於文字的分析對他啟發甚大。但柄谷沒有順著德希達開拓出來的路接力往前，反而由索緒爾於日內瓦大學教職的就職演說開始討論。柄谷以為，索緒爾之所以回到瑞士的原因在於他不願為了得到法蘭西學院的職位，放棄瑞士籍，歸化為法國籍。國籍問題事關政治、語言以及認同，並非單純出自學術的考慮。

柄谷以為，1891 年 34 歲的索緒爾回到瑞士之後，直到 1913 年去世為止，沒有發表任何著作。而最著名的《普通語言學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6) 也是身後由兩位學生——巴利 (Charles Bally) 與薛施藹 (Albert Sechehaye) ——蒐集課堂筆記編纂而成，這樣的沈默顯得非常不尋常。柄谷認為，「儘管不確定索緒爾拒絕入籍法國是否與作為瑞士人的民族主義有關，但很明顯，索緒爾危機性地意識到了語言學家的政治功能。」⁴⁶ 而這一切都與他就任日內瓦大學的就職演說有關。索緒爾在演說中指出：「語言學給民族學帶來的巨大而明顯的影響。未經詳盡調查之前，語言材料常常是民族誌學頭等重要的資料。因此有待追問的是，為什麼沒有這樣的材料，民族誌學者就絕不

⁴⁶ 柄谷行人：〈民族—國家和語言學〉，收入《民族與美學》，頁 137。

會妄下論斷呢？」⁴⁷ 索緒爾指出，民族誌學者以語言的親緣性作為定義同一民族與否，混淆了現實中的民族歷史以及語系之間的關係，好比瑞士境內說法語的人與說德語的人，是否更接近法國人與德國人，如果是這樣，那麼瑞士人將如何自我認同？另一方面，現實中彼此恨入骨髓的捷克人與德意志人，卻是非常相近的民族。柄谷以為，索緒爾的演說顧及了當時的歐洲現實政治發展型態，而發出的省思。⁴⁸ 特別是普法戰爭後的法國，民族主義高漲。有鑑於此，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在 1882 年於索邦大學的會議上，發表了一篇〈民族是什麼？〉（“Qu’est-ce qu’une nation ?”）的論文，就在反省這個問題。勒南指出，無論是種族、語言、物質利益、宗教親和性、地理、軍事上的必須等，絕非民族的構成基礎，因為現存的疆域國界等，不過是歷史上人類自我征戰的殘留罷了。「民族的存在就是一種逐日進行的公民投票，就像個人的存在是一種對生活的反覆肯定一樣。…民族的意願就是它唯一的合法性標準，各種標準終將匯融為這種意願。」⁴⁹ 在勒南的演說中，歷史語言學家證明了語言的變化其實來自人類內部遷徙以及種族相互混雜，因而語言不能作為民族認

⁴⁷ 轉引自同前註，頁 137-138。

⁴⁸ 柄谷行人：〈民族—國家和語言學〉，收入《民族與美學》，頁 139-140。

⁴⁹ Ernest Renan, “Qu’est-ce qu’une nation ?,” pp. 1-2. 文本取自網路，參見：http://www.iheal.univ-paris3.fr/sites/www.iheal.univ-paris3.fr/files/Renan_-_Qu_est-ce_qu_une_Nation.pdf
查閱日期：2019 年 08 月 01 日。

同的基礎。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勒南的民族乃是一種以公民身分作為認同的標準，這一點德希達在回應柄谷的論文時，特別舉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作為例證，說明其思想中帶有的帝國主義。

柄谷認為，索緒爾不可能不知道勒南的論文，在回到日內瓦三年之後，法國就發生了反猶太的德雷福斯軍官事件。對此，柄谷認為，「索緒爾敏銳地意識到語言學極大地助長了此事」⁵⁰。在他看來，但若是因此認為索緒爾的語言學忽視了歷史與政治的因素、重視語言而將文字排除在外，並將其歸於結構主義，毋寧說，這是誤讀了索緒爾。把語言放在系統內考察，而將其他要素都放在語言外部來對待，柄谷認為，「這意味著語言是絕對外在的東西」，「索緒爾所謂的內部語言學則意味著語言被暴露在絕對的『外在的』東西中」⁵¹。

與德希達對索緒爾的考察完全不同的是，柄谷認為索緒爾對文字的態度並非次要於聲音，而是把文字看成語言的外部，兩者的重要性不同。柄谷認為，把聲音語言擺在首位的是浪漫派的語言學家，而近代民族主義興起跟浪漫派脫離不了關係。柄谷同意德希達的結論，亦即人類是先有文字；但他認為，是浪漫派主張

⁵⁰ 柄谷行人：《民族與美學》，頁 139。

⁵¹ 同前註，頁 139、141。

聲音語言從感情或者內面直接表現出來的，並由此認定聲音的首要性。事實上，「作為浪漫派出發點的聲音語言是在翻譯帝國語言（拉丁語、希臘語、希伯來語）的過程中形成的。」⁵²也就是說，今日我們所見的法語、德語等，乃是過去帝國語言——拉丁語的遺緒，而帝國瓦解時，浪漫派利用了這一點來建立自己的民族認同。此外，沒有文字將語言加以記錄下來，所有的語言研究都是不可能的。而一旦能夠通過文字記載來保留語言，就意味著此語言處於文明或者國家狀態才有可能；但歷史語言學卻以聲音語言為出發點，無視於此，企圖建立起民族的歷史。柄谷正是以此強調文字的重要性，「若去掉文字，則歷史語言學難以成立」⁵³。真正讓柄谷確立了語言作為批判的外面力量，還是在於索緒爾的大學就職演講，索緒爾說：

語言不會死亡，也不會壽終正寢，突然猝死卻是可能的。它的死法只有一種，就是由於完全外在的原因被徹底抹煞。例如，操此語言的民族被趕緊殺絕…或者還有強大的民族將自己的特殊語言強加於人。這種情況下，光憑政治的統治是不行的，首先需要確立文明的優越性，而文字

⁵² 同前註，頁 140。

⁵³ 同前註。

語言的存在通常是不可或缺的，就是說必須通過學校、教會、政府即涉及公私兩端的生活整體來強行推進。⁵⁴

無論如何，語言的變化或消亡，都是因為外在的要素發揮作用，而非語言本身的變化，因此沒有必要將政治社會制度的興衰投射到語言上，例如錯誤地認為法語是拉丁語的子語。

柄谷進一步表示，索緒爾將文字書寫排除在語言學之外，「是因為文字書寫會積極地將時空界限並不明確的語言明確化，例如，用文字記錄著某種方言就是使其明確化，並由此將其轉化為規範性的東西。」⁵⁵ 也就是說，我們今日所稱的法語或者德語，那是因為眾多語言中的一種取得了制度上的特權地位，因而得以通過文字的記載被流傳出來，而沒有獲得特權地位的方言的消失，都來自這種取得特權的方言壓制所故。

五、帝國、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

我們可以理解，柄谷想把語言從政治社會以及文化制度等中分離出來，這是為了批判某些出自政治或者心理的需求而附著在語言上的意識型態，例如語音中心主義就是民族國家的產物。事

⁵⁴ 轉引自同前註，頁 141。

⁵⁵ 柄谷行人：〈民族—國家和語言學〉，收入《民族與美學》，頁 144。

實上，柄谷的批判正是在於此，即批判帝國主義。

對於帝國主義，柄谷有簡短但精采的論述。首先，他以為帝國只是一種制度，通過法律統治著各部族，事實上是「對各部族、國家間的交通、通商安全的保證。帝國的法律基本上是國際法。」⁵⁶ 柄谷進一步說明，這種國際法的特徵，乃是透過服從與保護的模式進行的，意即對於受到帝國統治的部族而言，只要服從與納貢，就可以保有原先的生活模式，無需改變，而帝國也不會試圖全面同化被征服的對象。柄谷以漢帝國與匈奴之間的關係為例，他以為匈奴看似表面服從且朝貢，但實際上，則是通過贈與或者婚姻來維持和平，這種交換模式，柄谷稱之為交換模式 B。⁵⁷ 相對來說，建立在商品交換的貨幣經濟體制中，就稱之為交換模式 C，這種模式強調共同體之間的商品交換，其成立的前提乃是為了能順利交易商品的法，因此若是漠視或者違反契約的違法行為，則有隨之而來的規定分明的罰則。柄谷以為帝國主義就是建立在交換模式 C 上，這也是為什麼他認為「帝國主義從其他國家奪取的，主要是關稅權。」^{58,59} 帝國的第二個特徵是擁有

⁵⁶ 柄谷行人：〈序說——民族與美學〉，收入《民族與美學》，頁 33。

⁵⁷ 柄谷行人：《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林暉鈞譯（台北：心靈工坊，2015），頁 122-123。以下將簡稱為《帝國的結構》，不再贅述。

⁵⁸ 柄谷行人，《帝國的結構》，頁 123。

⁵⁹ 柄谷在《帝國的結構》一書中對帝國主義的批判不遺餘力，他認為，這種關稅權使得今日不再有帝國存在，但通過表面對自由與民主主義的獎勵，也能得到利潤，同時還能支配其他國家。這也是帝國與帝國主義最大的差別。柄谷行人就以交換模式來說明社

世界宗教，「世界帝國是通過整合各部族國家而形成的，這時就需要有超越了各個國家、共同體的宗教的普遍宗教。」⁶⁰ 唐朝的佛教就是在擴張到歐亞大陸時而興盛起來的，先前法家思想或者儒家思想已經不足以整合帝國內部各部族了。第三個特徵則是世界語（*lingua franca*），例如拉丁語、漢字等，就是帝國內部使用的通用語言，而帝國內部則有數不清的方言、俗語等。世界語的特徵是抽象且超脫的，而方言俗語等聲音語言則是低下、卑俚的。這樣的地位，一直到民族主義的興起才有所扭轉。⁶¹ 也正是因為從帝國中掙脫的過程中，柄谷以為，「重要的不是用文字來書寫俗語，而是用俗語來翻譯世界語，例如，正是因為路德用俗語翻譯了《聖經》，所以才由此形成民族的德語。」⁶² 他進一步認為，民族語言雖是通過翻譯完成的，但卻會被認為是直接由情感與內面生發而成，事實上，當浪漫派哲學家開始考察語言的起源的時候，民族語言已經完成了，「他們找出的聲音語言已然是從書寫語言（帝國語言）翻譯過來的東西。換個角度說，他們發現的感性是業已經由了理性的東西。」⁶³ 柄谷認為，當民族國家

會之間的來往與交流，交換模式 B 以及 C 如正文所述，不再贅述。至於交換模式 A，則意味著部族之間以贈與以及回禮為模式的互酬式交換。這幾個模式的進一步說明，詳第一章第四小節〈交換模式的導入〉以及第三章〈專制國家與帝國〉。也由於這些社會交換模式並非本文論述焦點，且問題過於複雜，非本文所能處理，因此僅能留待日後專文深入討論。有關這一點的補充，也感謝審查人的提醒。

⁶⁰ 柄谷行人，《帝國的結構》，頁 110。

⁶¹ 柄谷行人：〈序說——民族與美學〉，收入《民族與美學》，頁 33-35。

⁶² 柄谷行人：〈書寫語言與民族語言〉，收入《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頁 195。

⁶³ 柄谷行人：〈序說——民族與美學〉，收入《民族與美學》，頁 36。

想要以民族—國家的方式成為帝國，則必定走上帝國主義。帝國只關心形式性的統治，對於帝國內部各民族如何生活、講什麼話語並不關心，而民族國家則要求國民的均質性與認同，「民族—國家一旦擴大，即便自稱帝國，也不再是從前的帝國，而應被稱為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民族—國家的延伸，也是強迫其他民族均質化的東西。」⁶⁴

正因為柄谷看到民族國家擴張為帝國時，走上了帝國主義，這使得他激烈地批判日本自十八世紀後半以來的思想，為了脫離西方帝國主義殖民的現代化，而出現的國語的言文一致運動，並上溯至對表音文字的使用，例如對《源氏物語》的溯源。而這一系列的變動中，柄谷則批判了以時枝誠記（Tokieda Motoki，1900-1967）為代表的國學語文運動。⁶⁵

德希達在回應柄谷對於民族與語言問題時，則特別指出費希特的策略。費希特也強調德語、德語性和德國語言、德語口語同民族無關，甚至在語言學意義上的語言也無關。費希特以為，一個不能思考他的哲學的人，即便能把德語講的再完美流利，也不

⁶⁴ 柄谷行人：〈民族—國家和語言學〉，收入《民族與美學》，頁 135。事實上，柄谷行人在《帝國的結構》一書中，也不脫上述的觀點：「總結來說，第一，帝國具有統合多數民族、國家的原理，國民國家則不具有這樣的原理。第二，像這樣的國民國家擴大而支配其他民族、其他國家的時候，並不是成為帝國，而是成為帝國主義。」（柄谷行人：《帝國的結構》，頁 122。）

⁶⁵ 限於篇幅與專業能力，我們無法在此討論柄谷如何批判以時枝為代表的日本國語文運動。詳見：柄谷行人：〈民族—國家和語言學〉，收入《民族與美學》，頁 146-160。

屬於我們的德語性（our *Geschlecht*）；相對的，如果有人能思考他的哲學，那麼即便他用的是別的语言，他便是具有德語性。德希達下結論說，費希特不單是民族主義意識，而更是充滿了帝國主義意識。⁶⁶ 因為當民族意識抬頭，便藉此意識以削弱、均質化，甚至是消滅其他文化，也就是一種文化上的帝國主義了。

另一方面，德希達則提醒，語音中心主義與語音文字表記兩者並不相同，雖然它們都造成了普遍化運動，但這運動卻不一定與民族主義不相容。也就是說，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國際主義甚至普遍主義是可以和諧相處的，彼此之間未必是單線式的推進。放到索緒爾的例子來，德希達提醒我們，歷史語言學的語音中心主義不單是民族語言理念的增長時期同時出現的，柄谷雖然指出它事實上是強化了這個理念，但強化因素並不是原因，因此兩個現象可以被分離。⁶⁷ 正因為可以分離開來，中間有太多複雜的政治因素可以分析，無法簡化。對此，最佳的證明則是德希達在 1996 年出版的《他者的單與主義－或起源的異肢》（*Le monolinguisisme de l'autre ou la prothèse d'origine*）。在這本約 140 頁左右的篇幅裡，德希達細細地梳理了他所成長的阿爾及利亞的語言歷史。在德希達的陳述裡，自 1830 年起，法國有計畫地向阿爾及利亞擴張開始，這塊位於非洲原來以柏柏爾人（*Berbères*）為

⁶⁶ Derrida, "Introduction to Kojin Karatani's "Nationalism and Ecriture" A Discussion Summary by Megan Becker-Leckrone," p. 7.

⁶⁷ *Ibid.*, p. 4.

主的文化，繼中世紀伊斯蘭教與阿拉伯文化入主此地，長期影響之後，法國終於也把勢力伸向了非洲。法國於 1870 年頒布了克米厄法案（Crémieux），宣布阿爾及利亞的居民有資格獲得法國公民身份開始，法語就以官方語言的姿態，正式進駐到這塊柏柏爾語、阿拉伯語、希伯來文共生的土地上。這種以強勢姿態入侵造成的結果便是，當地的文化遭到各式各樣的條約、規定等戕害而崩解。這種崩解使得當地人在文化上無法自我認同、在語言的使用上遭到剝奪，記憶無法延續等。總歸來說，不同於柄谷，德希達對此的解構手法乃是從法與國家行政命令的頒布為進路，依此討論國家力量對於殖民地的語言起的作用。儘管柄谷對索緒爾的「改造」令德希達也深覺讚賞，但各種主義所引起的國際政治問題，其複雜的狀況，絕非柄谷的單線式假設的推進就能概括。

六、結論

自七零年代前去耶魯大學進行訪問以來，柄谷行人便通過保羅·德·曼，對德希達的解構思想有所了解。到了《作為隱喻的建築》（1983）便直言他就是以建築的角度來思考解構，一直到這場以柄谷行人的思想為主題的研討會，我們都可以看到，柄谷雖然在立場上與德希達並不相同，甚至多有對反之處，但兩人的對話一直未曾中斷。在這場研討會中，柄谷的論文雖然存在不少

對德希達的誤讀，例如，柄谷以為德希達將語音中心歸為西方獨有，對此，德希達便提出異議。但德希達自己也坦言，柄谷的論文的确內涵豐富，並討論了許多的文化以及其中的難題，的确有其獨特的創見。⁶⁸

柄谷對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改造」不無道理，即通過了「內面化了的民族語言」而揭示出外部力量對語言影響的要素。事實上，索緒爾對於現存語言的研究，的确也是通過符號記錄倖存下來的語言。就這一點而言，正好顯示出柄谷的方法論，即揭示出「裝置」所引起的顛倒觀看，柄谷稱之為「現代認識論的裝置顛倒」。⁶⁹ 放在民族國家與語言學的問題上，文字便是那個裝置機關。文字這裝置使得我們不自覺地顛倒了對語言起源的探討。柄谷對於形式化的重視，並剔除了情感或情緒等因素，使得他更像康德主義者，而不是浪漫派的主張。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忽略了經驗性的探討。剛好相反的是，通過這種形式化的裝置，他由此開始討論裝置化形成的條件乃是受到了外在經驗性因素的影響，這也是他對於索緒爾的語言學的討論，放入民族國家形成的背景的原因。也就是說，他以為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的形成，必須考慮到當時複雜的歐洲政治情勢背景。

⁶⁸ 見 Derrida, "Introduction to Kojin Karatani's "Nationalism and Ecriture" A Discussion Summary by Megan Becker-Leckrone".

⁶⁹ 有關柄谷的方法論，詳見：柄谷行人：〈風景的發現〉，收入《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 1-34。

另一方面，比柄谷更早開始討論西方語言理論的德希達，其採取的進路則是從西方語言的結構入手，這使他得出語音在西方思想中的特權地位的結論；也是因為語音特權，導致西方哲學從柏拉圖開始便注重「在場」(présence)，從而貶低了文字的地位。再者，對於柄谷將索緒爾的分析又帶出帝國與帝國主義的問題，德希達沒有將這兩個問題緊密叩合，而是認為國際情勢的複雜狀況，無法以此單線式地推進，儘管柄谷對索緒爾的「改造」的確有啟發人心之處。雖然德希達與柄谷的方法進路不甚相同，兩相比較之下，柄谷的分析手法更能突出某種形式化底下無法容納的經驗性因素，但也因為如此，此種形式化的手法就顯得單線、對梳理事實的解釋上稍嫌薄弱了。而德希達這邊，採取了進入問題內部分析的進路，看起來十分古典傳統，也正因為如此，呼應了他長期以來的解構手法。

最後，放到今日的全球情勢來看，一百多年前勒南的話，於今仍然有效：「民族並不是永恆的東西。它們有其起始，也有其終結。歐洲聯邦的意願很可能會取代它們，但這並不是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紀的法則，如今，民族的存在是一件好事情，甚至是一種必須。它們的存在是自由的保證，而如果有朝一日，世界只存在一種法則和一位主人時，這種自由就會不復存在。」⁷⁰就本

⁷⁰ Renan, "Qu'est-ce qu'une nation?" p. 9.

文論旨語言書寫與文化普遍性而言，無論德希達還是柄谷行人，對於擁護自由與批評專制不遺餘力。也是出自對專制暴力的批評，使得他們各自小心翼翼地分析構成帝國主義的可能性因素，就本篇兩位思想家的交集——索緒爾的語言學問題而言，在德希達那裡，分析出來的是語音與形上學的聯合特權，在柄谷這邊就是其語言學中通過裝置而暴露出來的內面化問題了。

參考文獻

中文書目

- 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起源》，趙京華譯（北京：北京三聯書店，2003）。
- ：《帝國的結構：中心·周邊·亞周邊》，林暉鈞譯（台北：心靈工坊出版，2015）。
- ：〈序說——民族與美學〉，收入《民族與美學》，薛羽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6），頁 1-44。
- ：〈民族—國家和語言學〉，收入《民族與美學》，薛羽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6），頁 133-160。
- ：〈風景的發現〉，收入《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頁 1-34。
-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台北：弘文館出版，1985 年）。
- 屠友祥：《索緒爾手稿初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德希達：《論文字學》，汪堂家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年）。

西文書目

Aristote, *Catégories De l'interprétation Organon I et II*, trans. J. Tricot

(Paris : Vrin, 2004).

Derrida, Jacques.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Minuit, 1967).

———.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Paris: Seuil, 1967).

———. “Introduction to Kojin Karatani's “Nationalism and Ecriture” A Discussion Summary by Megan Becker-Leckrone,” *Surface*, Vol. 5 (1995).

———.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Paris: Galilée, 1996).

Foucault, Michel. *Les mot et l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1966).

Renan, Ernest. “Qu’est-ce qu’une nation?,” available from: http://www.iheal.univ-paris3.fr/sites/www.iheal.univ-paris3.fr/files/Renan_-_Qu_est-ce_qu_une_Nation.pdf 查閱日期：2019年08月01日。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s. C. Bally and A. Sechehaye (Paris: Payot & Rivages, 1995).

———.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remier et troisième cours d'après les notes de Riedlinger et Constantin*, ed. Eisuke Komatsu (Tokyo: Université Gakushuin, 1993). 轉引自屠友祥：《索緒爾手稿初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Language, Writing and Cultural Universality:
Debate between Jacques Derrida and
Kojin Karatani on Language and Identity**

Huang, Ya-Hsie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notion of “cultural universality”, this study employs two approaches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of languages and imperialism. One approach focuses on the internal elements and structures of languages whereas the other approa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e aforementioned issues arise from a debate between Kojin Karatani and Jacques Derrida about linguist Ferdinand de Saussure’s theory. Karatani argues that Saussure tried to explore anthropological conditions grounded on languages. The formation of an ethnic language, nonetheless, is often the resul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nipulations. For Karatani, if one wants to study Saussure’s linguistic theory, he/she must consider not only the linguistic forms and structures that have long been the central concern of Structuralists, but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s and imperialism arising in the time in question. Karatani therefore disagrees with Derrida who analyses Saussurian theory in a deconstructive way. That is, Derrida's analysis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 elements and structures within a text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interplay of forces outside the text. In Derrida's research, Saussurian theory is regarded as phonocentric and logocentric, both of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Western metaphysical tradition.

In short, this debate about Saussurian linguistic theory involves linguistics itself, metaphysics,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lonialism.

Keywords: Language and Writing, Nationalism, Cultural Universality, Jacques Derrida, Kojin Karatani